

高校在努力提升国际化、培养国际化人才,但在世界教育领域中,中国声音却依然微弱。国际显示度与国际话语权不平衡的状态背后,是哪些因素在“作祟”呢?

显示度与话语权的“高”“低”杠

■本报记者 陈彬 见习记者 许悦

“排名是否各大学自愿参加呢?”“您能谈一谈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的相关问题吗?”不久前,在西南交通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规模不大却十分隆重的发布会正在这里举行。

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内容便是发布 2017 年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2017URI)。作为西南交通大学推进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工作之一,该排行榜旨在反映高校国际化水平的实际情况,助力中国高校国际化工作不断向前推进。2017 年是该校连续第五年发布该榜单。

在这份榜单中,国内各高校的总体国际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然而就在国内高校在国际上的显示度日益提升的同时,似乎高校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还不显著,这该如何解释?又该如何破解呢?

国际显示度与国际话语权的失衡

“经过研究发现,各高校国际显示度今年表现最好,优于往年。”在发布会上,主持排行榜编制工作的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闫勳在报告中提到。

据她介绍,对高校国际显示度的主要观测依据是 QS、USU 等世界大学排名以及各大学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数量和谷歌搜索量。从过去五年样本学校的平均分值来看,按照最高分 100 分归一化(一种简化计算的方式)计算,2013 年样本大学国际显示度平均分为 25.47 分,2014 年为 26.22 分,至 2017 年达到41.73 分,基本上呈现每年递增状态。

这种趋势的产生,正是得益于我国大学在国际著名大学排名中名次的不断上升以及各个大学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数量的增多。

比如,在伦敦时间 2017 年 6 月 8 日,英国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数据提供商 QS 发布的第 14 届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共有 39 所大学上榜,并且其中有 6 所进入了世界前 100 名。在 2017 年 11 月的 ESI 国际排名中,北京大学位居国内高校首位,国际排名 112 位,入选 ESI 前 1%学科总学科数达 21 个。而在 2015 年的国际 ESI 排名中,那时的北京大学同样是国内排名第一,但国际排名为 137 位,入选 ESI 前 1%学科总数为 19 个。可以窥见,我国高校在国际排名中成长之飞速。

但在这令人欣喜的飞速提升中,有一点却难以快速提升,成为了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短板,那就是国内高校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集体沉默”。

以国际标准的制定为例,一项 2015 年的数据显示,在当年所有的国际标准中,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仅占总数的 0.7%。而在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完成的。

对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张晓刚曾表示,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也许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们付出多少,而是要权衡我们不参与会失去多少。“标准的主导者一定是技术的领头羊,标准从不成立,它们反映了制定者的优势和创新点,不参与标准化意味着将话语权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具体到高校领域,闫勳表示,我们所谓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高校国际显示度高,是在自己教育领域内与之前相比较有所提高,但是如果将一所大学放到国际层面去,在科研成果方面以及人才国际竞争力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是略为弱势的。“高校在努力提升国际化、培养国际化人才,但在世界教育领域中,中国声音却依然微弱。”闫勳说。

那么,这种国际显示度与国际话语权不平衡的状态背后,是哪些因素在“作祟”呢?

国际组织参与度与主导权的掌握

2014 年 9 月,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塑料技术委员会(ISO/TC61)第 63 届年会上,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孙辉代表我国提出的吸收血液用聚丙烯酸盐 ISO 标准提案获得立项批准,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孙辉被任命为工作组召集人。这是塑料标准领域首次由中国人担任此职务。

“在此之前,塑料领域的标准制定一直都是由欧美、日本等把持的,我们一般是将这些标准同等采用或修改采用,而这次是我们主导制定的标准,并且该标准已经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发布了。”孙辉感到很骄傲。

然而,这份“骄傲”却来之不易。

孙辉工作组所在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日本。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行政上,他们联合美国、德国专家都为“初出茅庐”的孙辉工作组设置了不少障碍。“高校国际化需要做到‘国际组织有职位、国际会议有声音’。在某些国际组织中没有一定的参与度和职位是很难提高话语权的。比如日本在塑料领域一直做得非常好,他们经过努力把其他国家不做的项目都承担过来,所以在塑料领域日本的话语权就会比较多。我们第一次申请制定标准自然会受到诸多的限制与阻碍。”孙辉解释道。

“一个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就是全世界的规则,如果不增加参与度甚至掌握主导地位,那么中国规则就很难推出去,很难有话语权。”闫勳说。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正在逐步提升。比如,就在 2017URI 发布前不久,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成功当选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候任主席,这也是该组织成立 50 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当选主席。

然而,对于主导权的掌握而言,仅仅“参与”是不够的。

“目前,我国自己创建的科技类、文化类、教育类国际组织,相较于美国的 500 多个,实在是太少。”闫勳说,在这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很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创力就没有话语权。即使我们加入别国创建的国际组织,成为一个成员,而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也同样不会有很高的国际话语权。”

高校人才培养与重视程度的不足

伴随着高校在国际显示度上的提高,各校在人才培养上下了大功夫,在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同时,努力加强与其他国家高校的联系并吸引各国留学生来华深造。然而,2017 年 7 月发布的《2017 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却显示,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得分第一的上海竞争力指数也只是刚及格线。总体上,中国国际人才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闫勳表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来源于人才,这就要看一所高校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但是很明显的,我国人才国际竞争力还是要弱于欧美国家。而在对国际人

才的吸引力上,虽然来华留学生数量提升迅猛,但是数量仍偏重于亚洲、非洲等,因为我们政府的一些奖学金政策会吸引他们。”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也直言,我国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与高等教育强国还有显著差距,中国高校目前还无法成规模地吸引世界第一流的学生和教师。

除了人才培养上的缺陷外,对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重视程度不足,也是导致高校国际话语权低的一大因素。

“我国高校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固然很高,但是对于话语权的重视却刚刚起步。”孙辉表示,在他的吸收血液用聚丙烯酸盐 ISO 标准做成之后,学校科研处在网上发出了新闻报道,这是一种重视,但高校并不将其视作高校教师更本质的工作。“牵头制定这两项国际标准耗费 4 年的时间,如果把这些时间用在论文上,从科研考评的角度来说会更受高校认可。高校可能更看重教师教学和专业论文水平。”

复合人才培养与输送的双合力

高校国际显示度与国际话语权本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存在,但前提是要达到一定的平衡。面对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高校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国际显示度不断升高的基础上,逐步填补国际话语权短板,逐渐达到平衡呢?

孙辉认为,要提高国际话语权,高校就要参与到国际组织中,提高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意识;并培养一批“懂专业、懂外语、懂规则”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所谓懂专业,就是具备相关学科知识,了解自身产品;懂外语,就是要熟练掌握英语,能够书面和口语流畅阐述观点,将思想传达出去;懂规则,就是要能够清楚理解、掌握、利用国际规则。

“其中,懂国际规则对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要想发出中国声音、制定中国标准,首先就要掌握国际规则。实际上,欧美对国际规则非常清楚,甚至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他们是在‘玩’规则,是随心所欲地在驾驭规则。而中国在标准制定等方面刚刚起步,在琢磨研究规则的阶段,这就是差距所在。”孙辉说。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 10 月 14 日为世界标准日。2017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当年的中国主题确定为“标准联通‘一带一路’,人才铸就标准未来”。据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介绍,我国现有标准技术专家超过 4 万名,但与标准化改革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大力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标准化人才队伍。

也正是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标准化人才,近日,国家标准委和清华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中增设标准化方向的人才培养。

在闫勳看来,我们把中国的教育标准传达给全世界,向世界教育交出中国方案,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许多高校都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或者技术服务来参与进去,同时也培养当地的人才,这就是很好的参与国际事务、提升话语权的方式。”

尤小立

2018 年中国高教面临十大问题

岁末年初,人们总是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2017 年总体是比较平静的,但一些政策的出台也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些反应自然会影响到 2018 年,形成持续性的效应。当然,一些阶段性的趋向和做法也会延续到 2018 年,它们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笔者不揣陋陋,尝试从下面十个方面来展望 2018 年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名与实。就在去年年底,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纷纷公布了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2020 年应是一个关节点,上述三所高校都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如果从今年算起,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个消息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担忧。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最大的问题便是“世界一流”如何去评判?如果依据国际上几个著名的大学排行榜的指标来建设,这肯定会走向另一种应试,结果可能是排行与实质之间的不匹配。

二、“双一流”的衡量标准。2017 年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学科名单无疑在国内高校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这个方案替代了以往的“985 工程”“211 工程”的划分。这就是管理模式而言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不采用申报制、指标相对客观的确是一大进步,不过问题仍然在评判标准上。因为客观指标可以用于评判现有学科水平的高下,却并不一定能以此来确认是否“世界一流”。国际高等教育界公认的“世界一流”首先是动态的,且不是完全是指标,它还有主观的学界威望和社会影响力,甚至会以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基础。

三、学科建设如何回归学术。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但它与大学建设本身是有区别的。前者在当下中国,综合性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后者则相对单纯,更多地以科研与教学为目标。以往学科建设更多地反映出行政特色,也就是说,学校管理者的倾向性和学科背景往往决定了该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轻重缓急。那么,建设“双一流”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去行政化”,让学科回归学术。

四、“内涵建设”亟待深入。“内涵建设”是近两年高校最响亮的口号,“双一流”建设提上日程后,必然会要求“内涵建设”进一步走向深入。所谓“内涵”自然是相对“形式”而言的,但指标乃是形式,如果一味地围着指标转很可能是形式大于内涵,重新走上追求 GDP 的老路。

五、科研成果怎么挤水分。科研成果是大学之“内涵建设”的一种体现,严格地说,只有创新的成果才能称为“科研成果”;创新的幅度有大和小,但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现在的问题是,科研成果被戴上了许多宏大而失真的光环。由于体制不健全,科研工作者为了各种目的,私自或相互结盟,共同为科研成果注水,以致国家科研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六、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如何调动。教学是大学“内涵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在过去的一年中,教学是被议论较多的话题,这也说明类似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解决教学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解决人的问题,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或者说主观能动性便是关键。此处仅说一点,那就是规范多而个性少的建设方式是不可能调动教师积极性的。

七、人才引进的“去行政化”。东部高校到西部高校挖人才形成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似乎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2017 年终于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其实,最应该关注的还是人才引进过程中的行政因素。诸如“一锅端”式非理性的人才引进很多都是出于政绩而非学术的需要,而为引进人才所特制的“教授”头衔,已经让原本简单的教授四级岗位制为多重制、等级制所取代。

八、知识、就业、创业和素质之间矛盾的协调。理念的冲突也是大学教育在 2017 年的一个表现。知识的技术化、就业的现实性以及创业的热潮与人文、素质提升之间的抵牾愈加明显。这一矛盾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大学的未来走向。由于整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大学面临的局面很可能如中学一样,谁开展素质教育谁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因此,为避免再走弯路,高等教育基本取向应以宏观政策上的预警式把握和调整就相当重要。

九、非主流大学转型的困境。与“双一流”追求相关,同样也与高等教育调整相关的是“双一流”之外的大多数院校的命运。说起来,它们不免有两种选择:一是谋求上升,挤入“一流”;一是办学方向的调整,谋求务实。问题在于,没有哪所学校不想上升,而上升通道又并不宽敞。十、教师的工资涨还是不涨?已经不记得高校教师工资什么时候涨过,或许是经常涨却总是低于社会的发展和从业者的期待。总之,高校现在的问题是,参与经营的、名气大的,职务多和项目多的一部分人活跃于媒体,让社会误以为高校教师早已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而其实,高校内部的薪酬差距之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与曾经培养的毕业生以及校友相比,多数一线教师的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这里所说的涨工资是指普惠制,是希望让更多高校教师保持起码的尊严,使教师真正成为人人钦佩和羡慕的职业。

西南石油大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学生掉队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袁一萍 李佳悦

“在彝族年收到学校送来的礼物,心里特别温暖与感动。”西南石油大学 2017 级少数民族预科生潘则美收到学校从成都专程送来的新年礼物后感动地说,“虽然离学校有 500 多公里,2018 年才正式进入大学,但学校依然牵挂着我们,千里迢迢来看望我们。”

与潘则美一样感受到学校温暖的,还有其它 56 名在西昌学院就读的少数民族预科生。事实上,定期看望慰问少数民族预科生,只是西南石油大学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一个缩影。

关键在培养

去年 11 月,西南石油大学多部门负责人来到西昌,看望并慰问了该校 57 名在西昌学院就读的少数民族预科生。

而就在不久之后,场面却发生了“变化”。原来,在西南石油大学学工部部长蒲勇、教务处处长黄健全、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张敏与他们的一番交流与互动后,学生们渐渐壮起胆子,“请问老师应该如何选择专业?”“大学有哪些社团活动呀?”“学校有哪些资助政策?”……一时场面热烈。

来自内江的藏族学生陈梦娇说:“通过这次见面会,不仅增强了我对学校的了解,也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动力,为自己是西南石油大学的一名学生深感自豪和骄傲。”

据介绍,西南石油大学 2017 年招收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全都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的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学生。近三年来,西南石油大学共招收录取了 160 多名少数民族预科生。

“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和需要,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学生,我们主要投放

了电子商务、社会工作、会计学、公共事业管理、法学、土木工程、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等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张敏说,“只有结合地区实际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毕业后才能回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不但要把这些地区的学生招进来,关键是要把他们培养好。”蒲勇表示,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层教育薄弱等客观原因,这些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上,尤其是英语、数理化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为了帮助他们,学校实施了一系列的“精准化”学业帮扶措施。

那么,“精准化”学业帮扶措施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精准化”学业帮扶

从 2016 年开始,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长赵乾坤每周都要对同班同学杨小芬进行数学、英语等课程辅导。杨小芬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蒙古族的学生,上大学之前,她的数学底子薄,数学题都是靠死记硬背才勉强过关的,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在赵乾坤的帮助下,杨小芬的数学成绩提升非常快。

“以前数学是我学习的‘拦路虎’,现在高数都能考到 81 分,同学的讲解让我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让我的数学不再靠以前的死记硬背方式来学习。”杨小芬说。

据悉,西南石油大学在少数民族学生比较集中的经管院、法学院、计科院、土建院、材料院等二级学院成立了民族学生发展工作室,专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学业帮扶,推出“一对一”结对帮扶举措,采取 1 名成绩优秀学生对接帮扶 1 名学习有困难少数民族学生的方式,帮助解决课程学习中存在的困难。

不仅如此,根据课程难易程度,西南石油大

学还开设了高数与概率统计等基础课程辅导班,安排任课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重点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提升学习兴趣,改进学习方法。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基础比较薄弱的现象,学校为他们单独“开小灶”,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少数民族学生英语“零起点”辅导班。同时,学校成立了外语学习与国际化视野拓展工作室,实施少数民族英语学习“一带一”伙伴计划,充分发挥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科优势,为英语基础差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英语学习辅导,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应用能力。

黄健全表示,通过这一系列“精准化”的学业帮扶举措,有力地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困难,让少数民族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毕业生反哺家乡

西南石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李清勇 2014 年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金阳县,一直在基层工作。目前他任该县的扶贫办任职,冲在家乡脱贫攻坚致富奔小康的第一线。

据悉,西南石油大学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承担南充市蓬安县长梁乡鹤鸣颈村、凉山州金阳县天地坝镇新寨子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助力贫困山区的群众拔掉穷根。

学校关爱来自金阳、蓬安的贫困大学生,定期召开两县学生座谈会。去年 10 月,学校召开金阳县学生座谈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据统计,近两年西南石油大学为两县学生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63.47 万元,受益学生 166 人次;帮助 31 名两县学生获得了生源地、校园地助学贷款,贷款金额 25.54 万元,为 26 名两县学生提供了勤



西南石油大学教师向少数民族预科生赠送礼物。

工助学岗位,发放工资 4.47 万元。

反哺家乡是学校在扶贫中力推的理念。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像李清勇这样毕业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回家乡搞建设的少数民族学生还有不少。

“经过精心的培养,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呈现了愿意回、留得住、用得上的特点,他们绝大多数都愿意回到家乡,为家乡作贡献。”蒲勇说。

“扎根家乡在基层,守住初心为乡亲,继续努力前行。”在该校的 2017 届优秀毕业生成长事迹报告会上,来自经管院的彝族毕业生白夫则讲述了自己放弃在成都高薪工作,毅然回到家乡凉山工作的故事。“在家乡,我将开创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建设一个不一样的家乡。”

“精准扶贫,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党的十九大作出了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作为高校,就要发挥我们独特的教育优势,为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培养、输送高素质人才,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西南石油大学党委书记孙一平如是说。